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符号学原理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李幼蒸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符号学原理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李幼蒸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符号学原理/ (法) 巴尔特著;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08833-4

I. 符…

II. ①巴…②李…

III. 符号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053 号

本书的出版经由法国外交部资助

罗兰·巴尔特文集

符号学原理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李幼蒸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5 插页 3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1 000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

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 Urt 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 Montparnasse 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二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二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

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 20 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 19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 20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须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二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 10 卷 12 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

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 米什莱（1954）：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 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 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

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

“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人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译者前言

现代西方符号学，自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哲学家皮尔士于19世纪末分别创说以来，在各国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传统学科领域内不断续有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各国符号学学术终于汇聚为一股国际潮流，并被纳入各国科研和教育轨道。就在第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的1965年之前，罗兰·巴爾特的这本《符号学原理》出版了。从来未曾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巴尔特，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开始将符号学方法自觉地运用于文学和文化现象批评的意识形态分析，并最终将其本人最直接了解和运用的一些语言学和符号学概念、原则和方法，归纳为若干基本论述，以提供有关符号学的原则和方法的基本知识。结果，

就实际影响的大小和范围而言，巴尔特这本小册子竟然超过了许多语言学和哲学领域的符号学专著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内。一方面这固然因为巴尔特的这本书简明扼要、便于应用；另一方面也因为巴尔特本人的符号学观点的“理论適切性”安排得宜。本人不是任何领域专深学者的巴尔特，从各种专家著述中选取他认为有用和有价值的部分，按照自己的构想和设计，提出了这部相当实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手册。而其本人在此书中的特殊创意是，将结构语言学看做是符号学的组成部分，而非相反，尽管他本人持有很强的语言学中心论立场。和其他同时代法国诸多杰出语言学家相比，是巴尔特首先将语言学精神和方法拓广到整个文化领域，并使符号学和一般文化学结合起来的。另一方面，巴尔特又和美国及德国等哲学性、心理学性的符号学研究不同，强调结构语言学在文化符号学中的指导作用，其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其语言学中心论的。巴尔特并不重视任何将思想方法纳入学科系统的构想，因此《符号学原理》这本小书不是作为某种确定的理论基础而构拟的，而应视之作为一种实用性、暂行性较强的分析方法汇编。这样一种属于理论层级中等程度的文化符号学手册，倒是非常符合当代符号学正在发展中的学术特点。其目的在于启发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为他们提供一套现成可用的“教材”。其内容都是根据作者十多年来在写作和教学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而成。此书自1964年首次出版后，一直畅销于世界各国，其内容虽然涉及不少领域，但其主要目标是朝向文化和文学现象的两种普遍意义构造的：直接意义系统（直指作用）和间接意义系统（涵指作用）的构成分析。文学符号学主张，分析者和批评家应该透过文学和文化文本的表面意思，达到其底层及诸隐喻层上的“背后”意思。

此书出版后四十多年来，各国和国际符号学研究和教学事业的发展早已蔚成大观，文学和文艺符号学已发展成专深学科，那么时至今日这本《符号学原理》是否还保持着原初的重要性呢？我想趁“罗兰·巴尔特文集”出版之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巴尔特符号学”在今日符号学研究中仍然保持着它的特殊启示性意义。除了其中非常有用而且表述清晰的基本知识以外，巴尔特将不同来源的各种知识进行“搭配”的“实用性”符号学策略，显示了今日符号学界所普遍忽略的两种重要观点。一者是，巴爾特的符号学“实用主义”表明他并不重视根据现有相关知识来匆忙搭建任何符号学理论体系，而是着重于方法论搭配的课题適切性。机械性的知识吸收较易，体系性理论话语易于示人以“科学性”假象，但并不一定相关于符号学课题的解决。符号学课题的设定和相应方法论的选配，才是真正重要而又需高度智慧的创造性思考。后者涉及研究者有关跨学科关系性逻辑的把握和广泛的知识准备。再者，巴爾特的实用性符号学观点，还暗示着一种更具根本性的学术思想挑战。这就是，现存人文科学系统只是各种方法论的“工具库”，而非各自现成的独立运作系统。我们可以根据本书以及巴尔特风格的其他符号学分析来领会他的符号学特点，并深入理解所谓“符号学”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符号学的精义可以说是实践性大于原理性：即研究如何借取和运用各学科理论工具来处理各种具体的文本意义分析课题。此外，巴尔特本人对一些文学实证性研究的批评也可能不尽适当。符号学解释性的研究和科学实证性的研究，本来应该分属不同的理智运作层次。二者之间的有效沟通问题，要求我们完成更宽阔、更开放的知识论准备。因此绝对不存在什么“符号学科学”一类的“灵丹妙药”。不过，巴爾特的论述虽然不一定有理论体系的

严格性，却有其意义辨析的精细性。罗兰·巴尔特素来在社会问题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采取“不介入的最小立场”，在符号学分析中，其理论工具选择策略也采取了类似的谨慎而适中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他既未选择某种符号学学科的“教条主义”，也未采取某种哲学基础主义。而这两种理论倾向今日正在主导着西方各国符号学界，反而有成为符号学今后创造性发展的障碍之虞。

本书首先适合于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理论爱好者。这也是我于1984年回国后尽先译出此书时的主要考虑之一。无论从漫长的中国思想史来看，还是从20世纪思想史来看，中国都是一个“文学大国”。前者不仅指诗词曲赋，而且指一切散文类作品；后者则可以专指中国现代小说（现代诗歌则远远失去了古代时曾经有过的重要性）。所谓现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是文本意义多元构成研究。对此而言本书理论内容极具启示性和实用性。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引介来说，作者采取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方向的意义分析法，在我看来仍然应该属于今日符号学理论的主流。20年前本书中译本出版时，国内学界不仅对符号学学术极为隔膜，而且对其他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人文科学理论也不熟悉。二十多年来，国内的知识环境已经大为不同，已经读过和尚未读过本书的读者均宜于对本书重新加以研读，收益亦将较前为丰。青年读者甚至不妨将此书作为学习文化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的一部基本教材。

本译本在“罗兰·巴尔特文集”中的再版，使我有机会对原译本中处理失当和不妥之处加以订正。但是考虑到30年来中国符号学术语的运用远远未曾达到一致程度，所以在术语译法方面，变动不多。最后，对本书责任编辑的细心审校工作表示感谢。

目 录

导论	1
I 语言结构与言语	3
I.1 语言学	3
I.2 符号学的观点	12
II 所指和能指	22
II.1 记号	22
II.2 所指	28
II.3 能指	33
II.4 意指作用	34
II.5 值项	38
III 组合段与系统	42
III.1 语言的两根轴	42
III.2 组合段	46

2 符号学原理

III.3 系统	53
IV 直指与涵指	68
结论：符号学研究	73
概念索引	77
附论	83

符号学还有待于建立，因此我认为还不可能提出任何一部有关符号学分析方法的手册来。此外，由于其普遍性（因为它将是有关一切记号系统的科学），符号学的教学工作也将难以安排，除非这些符号学系统是在经验上构成的。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一步步进行下去，必须先研究某种知识。我们不得不通过一种尝试性的知识考察来摆脱这一恶性循环，这种知识将既是谦逊的，又是大胆的。谦逊是指，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大胆则是指，这种知识，至少在构想中，已经被应用于非语言的对象了。

我在此提出的这本《符号学原理》，其目的只是 20

要从语言学中引借一些分析性概念^①。这些概念，我事先认为，对于进行符号学研究来说禀具充分的一般性。在汇集这些概念时，我并不断言它们在研究过程中会始终保持完整；我也不断言符号学应当始终严格地遵照语言学模式。^② 我们满足于提出和阐述一套术语系统，希望这套术语系统，能够在大量异质的意指性现象中，导引出一个初步的（即使只是临时性的）秩序来：简言之，本书是与问题分类原则有关的。

因此，我们将把这些符号学的基本方面，按照结构语言学划分为四大类：一是语言和言语；二是所指和能指；三是系统和组合段；四是直指和涵指。我们会看到，这些分类是以二分法形式呈现的；我们将指出，概念的二元分类法似乎常常存在于结构的思想中^③，好像语言学家的元语言“在深层”复制着它所描述的系统的二元结构似的。此外，我们将顺便指出，研究当代人文科学话语中二元分类的突出作用，无疑是极富教益的。有关这些科学的分类学 (taxionomie)，在对其充分了解之后，肯定将提供有关我们时代中的所谓理智想象界 (l'imaginaire intellectuel) 的信息。

① “一个概念肯定不是一件事物，而且也不再只是对一个概念的意识。一个概念是一种工具和一种历史，即介入一个经验世界中的一系列的可能性与障碍。” [G. Granger: *Méthodologie Économique* (格兰格尔:《经济学方法论》), 23页]

②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过的危险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结构人类学》), 58页]。

③ 这一特点已为柯亨 (M. Cohen) (不无怀疑地) 注意到 [“Linguistique moderne et idéalisme” (现代语言学和唯心主义), 载 *Recherches Intern.* (《国际研究》), 1998 (5), 第7期]。